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    |                     |
|----|---------------------|
| 书号 | E2.1.3/<br>15555.19 |
| 册数 | 21003               |

# 論蘇聯羣眾歌曲

聶斯契也夫著  
安壽頤譯

資

21003

上海萬葉書店印行

---

# 論蘇聯羣衆歌曲

聶斯契也夫 著

安 壽 頤 譯

上海 萬 葉 書 店 印 行

---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印刷·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初版

## 論蘇聯羣衆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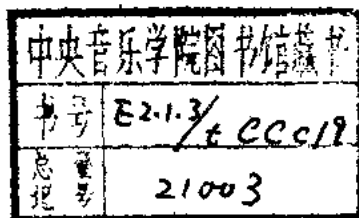
實價二千五百圓

原著者 蘇斯契也夫 譯述者 安壽頤  
發行者 錢 君

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南昌路四三弄七六號 電話八四九七九

電報掛號 三〇〇五〇



## 論蘇聯羣衆歌曲

我國現代羣衆歌曲的歷史根源是很長遠的。民間歌曲的風格，其來源約有數點：即在藝術容貌上很美麗的農民生活歌曲，明顯深刻寫情的城市歌曲，以及遠在一九零五年前即已成就了別具體裁描寫革命者——工人與學生——生活的羣衆政治歌曲。偉大的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人民生活上劃出新紀元，爲新歌曲開闢了寬闊的道路。

查柏耶夫（夏伯陽）的戰友——我國革命戰爭史家——福爾瑪諾夫（Фурманов）曾批評合唱曲對革命後俄羅斯生活之意義，他說：“織工們！他們曾經怎樣地唱，他們曾經怎樣地歌！祕密的這些年頭對於他們和歌曲，沒有白過去呀！在戰線上，在師部裏，沒有任何團隊，能像伊瓦諾夫-沃茲涅先斯基團那樣保存了鬥爭的歌曲，並那樣率直地，擁著無限的愛，熱烈的情感，把它們唱出來。那些歌燃起了各團部自尊和愉快的心情。歌呀！歌呀！你的能力，對人們的心的作用，是多麼偉大呀！”

誠然，羣衆政治歌曲，鬥爭和勇氣的歌曲，在祕密了若干年而得到自由後，在我國確是最受愛戴的一種藝術。

從革命初起時各革命倡導者即已向詩人們表示要求，要製

作合於被解放人民的精神與意志的新歌曲。高爾基有一次(在寫給詩人謝米諾夫斯基(Семеновский)的信中)曾說：“俄羅斯需要新的歌曲，頹廢的呻吟已經够了。”列寧在一九一八年與貝得尼(Бедный)談話時關於某民俗學家記載的老補充兵悲泣事件，所發表的意見更為明顯。他說：“這種反戰的，悲傷的，不志願的情緒是應當克服而且是可能克服的。只有製作新歌曲來代替舊歌曲，把習見的民間歌曲改造為新的內容。”

列寧的願望，在革命的年代裏，在新的藝術作品中實現了。這些作品在羣衆中流傳極廣。人民既爭取得自由表示羣衆政治趨向之權，遂特別提出了較往昔加強若干倍製作新歌曲的要求。新曲中併入了革命地下工作時的風格，民間合唱文化的優點，以及顯示蘇聯人民生活的新描寫的新線條。

新歌不僅限於點綴蘇聯人們的平時，它領導了並正在領導著走向鬥爭，它是他們戰爭時、節慶時、行軍時、工作時的忠實好友和旅途良伴。一九一八年游擊隊員爭取他們的幸福時唱著這種新歌，在建設瑪格尼特市及聶伯河水力發電廠的工事上，歌聲表現了發自內心的讚美，而第二次大戰的我國勇士英雄們在作戰時，口中都唱著他們所最愛的歌。

蘇聯羣衆歌曲的初步是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零年的革命戰爭時期，在這光榮的時期裏作戰的紅軍兵士們產出了無數歌曲，

---

注：貝得尼，見沃伊託洛夫斯基(Л. Войтоловский)所著戰爭之痕(По следам войны)第一版序。

又復活了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的風格，於是革命人士舊曲翻新調地把這些歌曲加以改造。革命戰爭時期最著名的一曲我們勇敢作戰去（Смело мы в бой пойдём），是由舊時平凡的浪漫歌白槐（Белая акация）的華爾茲曲調產出來的。人民的歌曲家改造了這平凡的曲調，配合了鏗鏘的節拍。（當年法國共和黨人亦曾將宮廷流行曲調改造成復仇者的威猛歌曲這樣就行了〔Ca ira〕。）

許多紅軍歌曲在革命戰爭時期是由舊時軍歌或烏克蘭及哥薩克活潑的民間歌曲改造而來的。例如烏克蘭一滑稽歌曲唉，那邊吵鬧些甚麼（Ой, що там за шум учинився）即用詩人貝得尼的句子改造成紅軍最愛的歌曲送別（Проводы）。這種有成果的改造，新羣衆歌曲作家瓦西里耶夫-布格萊（Васильев-Буглай）實發其端。

繼布格萊之後在紅軍中製曲的是在著名的騎兵部隊布瓊尼隊服務的作曲家坡克拉斯（Д. Покрасс）。他由南俄舞蹈體的城市歌曲製成的布瓊尼進行曲（Марш Буденного）一曲，長時間地流行在羣衆中。

烏克蘭西伯利亞烏拉嶺等游擊隊的歌曲在革命戰爭時期每有民謠體的優良作品。這些斯拉夫民歌，格調之廣，情節之美，差不多是永遠和新進行曲節奏的彈性的尖銳配合著。其中最優秀的歌，如遠東游擊隊歌（Партизанска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循山沿谷〔По долинам и по взгорьям〕）是作曲家阿歷山德羅夫（А.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 在二十年代之末寫出的(蘇聯國歌的作者)。

在革命初期，舊時革命運動歌曲如勇敢些，同志們 (Смело, товарищи, в ногу)，你們犧牲了 (Вы жертвою пали)，我們是鐵匠 (Мы кузнецы)等，在羣衆歌曲中亦極占重要地位，而永生的布爾雪維克頌歌國際歌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尤爲最著。

革命初期的民間歌曲既多源於舊的農民歌曲及城市歌曲，那麼，各作曲家製作新歌曲的組織工作，是開始於二十年代的中期的。其始，這些作品都是人工的，缺乏生命的，於是各作曲家試行發明理想的“無產階級的風格”，剔除所謂庸俗市民式的劣點。然而事實上各合唱曲常是死板的、繁重的，形成了公式頌歌，講究門面，華而不實的體裁。還有許多缺乏藝術性的合唱曲，更不適合於革命英雄的精神。這些歌曲都沒有獲得羣衆的流傳。

路線最健全的是民謠一類的作品，以阿歷山大·卡斯塔里斯基 (А. Кастальский 1856-1926) 的合唱作品爲最著。卡斯塔里斯基係第一流老音樂家，爲歌詠革命最力者。在這條路線上最羣衆化的作者，無疑的是瓦西里耶夫-布格萊，他的作品是歌詠農村時事的，略嫌粗淺，而對革命題材是確切的。在音樂的構造上和一般的趨向上，他是近於貝得尼體裁的。反響最少的歌曲是羅巴徹夫 (Г. Лобачев)，克拉塞夫 (М. Красев) 和郭赤瑪遼夫 (К. Корчмарев) 等的作品。

二十年代的後半期產生了天才的青年作曲家團體，這些作曲家是蘇聯音樂學校造就出來的。他們以革新家的姿態出現，既

否認母校教師們狹隘的流行的審美文化，更否認當時宣傳性音樂的拙劣廣泛。這個團體是由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學生，在有爲的青年作曲家達維典科（А. Давиденко 1899-1934）領導下組織起來的。他們的目標是製作羣衆的歌曲，反映蘇聯人民社會主義建設上勞動生活的歌曲。自然，羣衆歌曲和發達的合唱曲是他們喜愛的流派。他們把製作的使命，看作實習的課程，看作廣大羣衆給予他們的定貨單。因此他們乃採用集體製曲的方法，相互商討尋求新的接近羣衆的作品。因此他們自稱爲“撰作集團”（Троccoli），他們用這個名稱從一九二五年直到一九二九年。

達維典科是這一團體中最有力的作家。他很正確地了解了“蘇聯歌曲的新風格不是由實驗室的人造的理論所能產生的，而是必須把存在民衆中的有生命的曲調加以活潑的改造始能成功的”。爲尋求這種曲調的“原料”，於是他時而走向舊時的革命歌曲，時而走向頓河流域哥薩克族的口頭流傳的民間歌曲，時而走向下層市民的寫情歌曲。最後選定了民謠一類的風格，而把它的活潑的曲調加強起來。他的第一部作品——擬定爲俄羅斯民間合唱的行軍曲，類如：布瓊尼騎兵（Конная Буденного），第一騎兵隊（Первая конная），步槍（Винтовочка）等，都是現代題材有價值的表現物。羣衆都極喜愛他的歌曲，尤以一九二九年中東路問題引起衝突時的有人想打我們（Нас побить хотели）一曲爲流傳最廣。

“撰作集團”中與達維典科同一作風及學他的作風的，當推

舍赫特爾(В. Шехтер), 貝雷(В. Бельй), 科瓦里(М. Коваль) 陳貝爾志(Н. Чемберджи)等青年作家。

具有浪漫的熱情及進行曲的線條的性情的，是舍赫特爾的鐵的後備隊(Железные резервы)，空軍進行曲(Марш летчиков)。有舊時優良的革命歌曲形態而在當時流傳最廣的，是貝雷的合唱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具有柔和的抒情曲音調的，是科瓦里的歌詠青年和歌詠某大學生故事的作品少年(Юность)，動搖(Качка)，海之外，山之外(За морями, за горами)。

“撰作集團”的歌曲，實為最初深入民間的職業音樂作品。達維典科、舍赫特爾、貝雷、科瓦里等的成功作品，在二十年代之末，每於示威遊行時或工人的業餘合唱團的音樂會中被歌詠出來，而且得到極廣泛的流傳。

但有必須說明者，繼此之後有所謂“俄羅斯普羅音樂家協會”者出而造作虛偽的理論，影響所及，使這作曲家團體的作品都拘滯於少數的音樂形式範圍中。因而他們的許多歌曲所反映的蘇聯民衆生活和趨向，都形成比實際來得貧乏而粗簡了。

“俄羅斯普羅音樂家協會”既襲取了舊時無價值的音樂遺產，復自以為是唯一真純普羅作品而思有所壟斷，致使各作曲家本身及整個蘇聯音樂均不得向前發展。直至聯共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議決案，公布改造文藝組織後，我國藝術始獲得豐富發展的保障。此項議決案對於蘇聯藝術文化實

有巨大的意義。

新歌曲藝術真實的發展實始於二十年代中期，因為當時新的蘇聯歌曲的風格已達到結晶化的時候了。

如果說二十年代的歌曲是以普遍見稱，那麼現在的各作曲家是在培養著溫和深切而更浪漫的接近俄羅斯生活音樂風格的體裁。抽象的健全嚴肅的進行曲的格式，自不如深切的抒情曲調的易於透入聽衆心靈。新歌曲的形態幾乎同時產出在各種藝術部門：在有聲電影音樂裏，在新歌劇及交響樂裏，在紅軍自己的藝術活動中以及在演奏平臺和爵士曲目中。

新歌曲製作實取法且倡導於有聲影片。發其端者當推最先參與蘇聯影劇的音樂家蕭斯塔科維赤（Д. Шостакович）。他由艾姆列爾（Ф. Эрмлер）和尤特凱維赤（С. Юткович）的影片會見（Встречный 1923-）中產出的歌曲如會見之歌（Песня о встречном）用它的輕鬆的自然青春的色彩和長旋的曲調吸引了聽衆，使人想起巴黎近郊的無憂的歌曲。蕭斯塔科維赤樸實的歌曲在蘇聯歌曲發展程途上實居推動者的地位，聽衆們都歡欣地接受。

從會見一片開始的路線的繼承者是有名的蘇聯歌曲聖手杜納耶夫斯基（И. Дунаевский）。他的崛起是突然的。有一天在首都的銀幕上第一次演出了快樂的孩子們（Веселые ребята）輕鬆

---

注：這裏述說一件有趣的事情，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戰爭期間會見之歌一曲在北美合衆國獲得了新生命，美國音樂家竟依照蕭斯塔科維赤的曲調填上了一首聯合國歌。

的調子時，杜納耶夫斯基立刻成了著名的人物。特別使他享名的是他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間與影劇導演家阿歷山得羅夫合撰的電影喜劇快樂的孩子們（Веселые ребята）、馬戲團（Цирк）、伏爾加，伏爾加（Волга-Волга）。他的音調自然和描摹少年音聲的音樂，配合著詩人列別結夫-庫瑪赤（В.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的活躍的詩句，構成了新的美術性，十足表現了蘇聯少年樂天的心情。除了上述的快樂的孩子們以外，像馬戲團片中的祖國進行曲（Песня о родине），足球守門（Вратарь）片中的體育進行曲（Спортивный марш）以及格蘭特艦長的孩子（Дети капитана Графта）片中的快樂的風之歌（Песня о велемом ветре）等等都是這樣的。杜納耶夫斯基和列別結夫歌曲中指示人生的警句都成了蘇聯少年口中的標語，例如一生唱這歌的人永遠不會迷失的、喂，同志們，多生活罷！誰要找，誰就永遠找得到等都是。這些歌曲完全是意志堅決，對自己事業永遠不墮勝利信念的“現代英雄”的寫照。

在不久以前還被稱為“不合宜的”、“庸俗的”音調，由杜納耶夫斯基的妙手作成了羣衆的歌曲了。他使西歐的爵士音樂，輕歌劇及小喜劇的曲調都適應了蘇聯的條件。

此外杜納耶夫斯基更提倡尋求舊時俄羅斯城市歌曲中最生動的調子，這在蘇聯歌曲繼續發展上是占很重要地位的。在浪漫地描寫革命戰爭的回憶卡霍夫卡（Каховка）曲中他坦白地採用了幽怨的軍士歌曲可憐的人在軍醫院中死了（Умер бедняга в

больнице военной) 的曲調。於是久已習見的，在進行曲節奏範圍中具有粗陋軍士詩的溫暖的，浪漫的歌調，在這裏找到了新的現代化的歌聲。

於是許多歌詠革命戰爭並規律地同化了舊時城市曲調的回憶曲，都把卡霍夫卡作了藍本(如貝雷的小鷹(Орленок)，布蘭特爾(М. Блантер)的游擊隊員瑞列茲尼亞克(Партизан Железняк)，及坡克拉斯兄弟的騎兵隊(Конноармейская)等)。

這些歌曲警覺了一般青年，使他們記憶起先人的英勇，並養成他們將來戰鬥的準備。作家郭爾巴託夫(Б. Горбатов)的新作品中之一是這樣寫著：“他們都在黑爾遜的曠野中骨化了……就是水手瑞列茲尼亞克的墳墓所在地……而我們——後裔們——坐著聽到了。於是都撫摸肋下的手槍”。

有一次某女伶訪問作家奧斯特羅夫斯基並唱貝雷的歌曲小鷹——回憶革命戰爭青年英雄的歌曲。奧斯特羅夫斯基感動驚呼：“這是我們的歌”！他在貝雷的作品中感覺到戰鬥時的英勇。

坡克拉斯兄弟合作歌曲是繼承了杜納耶夫斯基卡霍夫卡曲的路線。他們的作品像騎兵隊(Конноармейская)和假如明天起了戰爭(Если завтра война)等說明了革命前俄羅斯工人歌曲的影響以及它的嚴肅的中心和赤裸的情感。舊時城市民間歌曲和生活實驗的音樂的反響，在他的莫斯科之歌(Песня о Москве)及三個坦克手(Три танкиста)曲中不難分辨，這兩曲流傳之廣且有超過杜納耶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之勢。坡克拉斯兄弟這些

歌曲深入在生活中，並在蘇聯人民生活最緊張時期獲得了特別的理想：在戰前的緊急時期都唱著假如明天起了戰爭，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一日歷史的日期中，蘇聯國都的保衛者們都唱著莫斯科是我的（Москва моя）。

坡克拉斯兄弟的作品略嫌簡陋，但是比較杜納耶夫斯基的輕鬆微笑的歌曲，是比較嚴肅的，剛勇的。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罷，他的歌曲在二次大戰初起數月之間就很快地流行在軍中。

杜納耶夫斯基及坡克拉斯兄弟的作品實在給適合聽衆要求的音樂途徑開闢了門戶。影響所及，從前致力於茨岡浪漫歌曲或沙龍親昵周旋歌曲的許多作者，都鄭重地趨向有意義的蘇聯歌曲的製作。如布蘭特爾，米留泰（Ю. Милютин）、里斯託夫（К. Листов）、克魯齊寧（В. Кручинин）等都是這類作家。

其中最著名的是布蘭特爾，他有特殊曲調的天才和趨新的感覺。使他享名的歌曲是斯大林之歌（Песня о Сталине），和採用伊薩科夫斯基（М. Исаковский）歌詞作為現代俄羅斯少女寫照的喀秋莎（Катюша）。

里斯託夫的成功作品，是急促音節的騎兵歌曲機關礮車（Тачанка）。

杜納耶夫斯基和坡克拉斯兄弟純抒情的作風在青年作家如赫連尼科夫（Т. Хренников）、波果斯羅夫斯基（Н.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卡次（С. Каз）、巴卡洛夫（Л. Бакалов）等的許多歌曲中得到了發展。

但是，如果說杜納耶夫斯基和坡克拉斯兄弟及其繼承者是主要的發展舊時城市民間歌曲風格或很少有的現代西歐歌曲，那麼其他歌曲作家所直接取材的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民謠了。

這裏第一流作家應屬阿歷山德羅夫。他是國內最受歡迎的蘇軍紅旗歌舞團的組織者。這個優越的男聲合唱團是由二百個紅軍勇士組成的，他們都是受過專門聲樂訓練的，這種現代軍歌優越模範已無休止地訓練了十八年。阿歷山德羅夫在完成許多革命戰爭歌曲工作上的作品中十足表現了他對俄羅斯合唱曲體的卓識。最博得人民愛好的是游擊隊之歌（循山沿谷），是最長久的一個蘇聯羣衆歌曲。阿歷山德羅夫在自己的作品裏或致力於紅軍進軍的或民謠的剛強的人民的風格（如梯隊曲（Эшелонная）及飛行員，從天上打罷！（Вейте с неба, самолеты!）），或致力於莊嚴偉大的史詩大合唱（如斯大林大合唱（Капота о Сталине），紅軍之歌（Песня о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等。而蘇聯藝術文化不可忘卻的勝利是紅旗歌舞團一九三七年夏天赴法蘭西與捷克和一九四五年赴芬蘭的旅行。

具有史詩作用的蘇聯國歌的優美曲調是出自阿歷山德羅夫的手筆，它象徵著我國進取力量之偉大與剛毅。

阿歷山德羅夫、杜納耶夫斯基及坡克拉斯兄弟均係曾經政府發給勳章的第一流歌曲作家。阿歷山德羅夫並獲得“蘇聯人民藝術家”的榮譽稱號，此種稱號只有蘇聯藝術界傑出的能手始能

得到。

基於作家與紅軍間的友誼而生的另一種有趣的產物就是克尼佩爾 (Л. Книппер) 的交響樂。到遠東陸軍和黑海艦隊的數次旅行推動了作家們走向理想的交響樂——描寫現代軍隊生活的聲樂的交響標語。例如他的第三部遠東交響樂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симфония, 1932-1933) 和第四部勇士共青團頌 (Поэма о бойце-комсомольце, 1933-1934)。克尼佩爾這兩部作品除音樂的表現戰鬥舞臺外，並插入了許多紅軍合唱團表演的羣衆軍歌。這樣使紅軍藝術走到高度的交響樂的培植，產生了很大的效果。特別著名的是第四交響樂中的原野 (Полюшко) 一章，它保持了民謠的高雅的風度配合著烏克蘭曲調的抒情並具有哥薩克合唱曲英武進軍的腔調。

新羣衆歌曲的音調同時透入了音樂藝術的另一部門——蘇聯歌劇。列寧格勒青年捷爾仁斯基 (И. Дзержинский) 是第一個敢於在歌劇中使用現代民主主義的和羣衆音樂的語言的作者。在他的描寫頓河哥薩克村革命的靜靜的頓河 (Тихий Дон, 根據蕭洛霍夫) 歌劇中大量的搬上了舊哥薩克曲和諧高雅的調子。最使人難忘的是劇中的一節合唱曲從一地方到一地方 (От края и до края)，它把斯拉夫歌曲悠長幽怨的樂調和活潑的進行曲的節奏冶於一爐。捷爾仁斯基的歌曲從歌劇舞臺上漸移到蘇聯各城市的街巷裏來，即如他的哥薩克之歌 (Казачья песня，歌劇被開墾的處女地 [Поднятая целина] 中之一曲) 已列入了行軍的紅軍上

演節目中。

新羣衆歌曲調子，主要的是由浪漫的城市民間歌曲灌漑而生的抒情的線條，構成了另一蘇聯歌劇——赫連尼闊夫的暴風雨中（В бурю）的基礎。赫連尼闊夫還有兩部以音調勝的電影小歌劇牧豚女與牧人（Свинка и пастух）和戰後下午六時（В 6 часов вчера после войны），以及其他一些成功的抒情歌曲（辭別（Прощание））都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獲得盛名的。

從事人民的作品的各作曲家中以札哈洛夫（В. Захаров）爲最著。札哈洛夫爲赫然獨步的皮亞特尼斯基人民合唱團的指導者，參加合唱團的都是俄羅斯中心各省的農民。札哈洛夫領導著這特出的鄉村能手集團從事造就複雜的多聲部合唱——需要專攻俄羅斯演奏技術的嗓音。札哈洛夫同一般大藝術家一樣，他不僅是利用著民間的歌謠，並把它發展起來，豐富了它的節奏，增加了現代民謠的成分和鄉村歌曲文化產出的音樂技巧。這樣使得札哈洛夫能把集體農場的鄉村中新的生活以及人與人間的關係生動地表現出來。他的合唱曲如沿著鄉村（Вдоль деревни），兩個鷹（Два сокола），小路（Дороженька），特別是抒情的送別（Провожание）、誰知道他（И кто его знает）等都是俄羅斯農民歌謠優秀作品的天然繼承者。

在歌曲中反映著蘇聯其他民族的民謠的作家當首推烏克蘭作家列烏次基（Л. Ревуцкий）及傑出的交響樂作曲家哈查圖良（А. Хачатурян）。列烏次基的作品係純烏克蘭的莊嚴的史詩大合

唱斯大林之歌，哈查圖良所作數曲則均脫胎於蘇聯東方的城市歌曲。他的最著名的曲子是交響樂式的斯大林頌（Поэма о Сталине），是用阿塞爾拜然陶澤市民間藝人米爾則（Мирза из Тауза）的歌詞寫出的。

民族音樂對蘇聯歌曲的影響愈來愈大，如烏克蘭的卸了馬，夥伴們（Распрягайте, хлопцы, кони），格魯吉亞的蘇利科（Сулико），白俄羅斯的你們都健康（Бывайте здоровы 劉班作），猶太的漁夫曲（Рыбачья 杜納耶夫斯基作）等是。這種國際主義構成了蘇聯歌曲的一種吸引力。

改造民間歌謠的傾向得到成百萬聽衆們的同情，同時並獲得當道偉人的支持。很明顯的，像阿歷山德羅夫在紅旗歌舞團的工作上得到了斯大林和伏洛希洛夫等寶貴的意見。勇敢地向人民學習，多採取人民作品的模質，是這個意見中的要點。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爲蘇聯羣衆歌曲發展到極點的時期。新歌曲之製作獲得向所未見的高度，形成了全國人民的藝術運動。舉一例來證明罷，一九三六年真理報舉行的優良歌曲競賽，收到的文藝作品竟有四三八九件，音樂作品竟有二一八六件之多。其中一二〇人係歌曲作家，有一千餘人係非職業性的作者。

著名的交響樂及器樂能手如米亞斯科夫斯基（Н. Мясковский）、普羅科非耶夫（С. Прокофьев），蕭斯塔科維赤、格里艾爾（Р. Глиэр）、哈查圖良、舍巴林（В. Шебалин）、卡巴列夫斯基（Д.